

历史上的宁夏(下)

吴忠礼



蒙元对宁夏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片战争焦土的荒凉废墟之上。蒙古大军在攻打西夏时，对西夏地区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做法，“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无一二，白骨蔽野”。元中统元年(1260)，蒙军大将浑都海又在六盘山发动叛乱，祸及整个西北，使得宁夏处境雪上加霜。直到至元元年(1264)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建立，郭守

敬随张文谦、董文用来到宁夏，对黄灌区的水利进行大规模治理，并设立西夏惠民局，诏令流亡难民回籍，后又陆续设立西夏营田司、西夏中兴等路新附军万户府和开成路陕西屯田总管府等屯田机构，“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戍兵万人”，屯田数达四千顷。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廷曾下令“徙翁吉刺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山”，就连南部山区

都能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北部黄灌区更是大量输出粮食，于是宁夏至东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漕运此时得到开通。元代初以行省治理原西夏故地，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置甘肃行省，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归甘肃行省管辖，地方行政建置以“宁夏”命名，宁夏得名始于此，其寓意是希望原西夏故地永远安宁！值得注意的是，宁夏这块多民

乘法的关系，一方为零，则满盘皆输，结果为零。

从未成年人自杀到犯罪等大大小小的事件，其病象凸显于学校，其实质植根于家庭，其恶化危害于社会。由此可见，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是教育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未成年人人生旅程中的第一站；学校教育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主课堂，是青少年学生成长的沃土，是未成年人生命扬帆的战舰；社会教育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大舞台，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双刃剑。这三者虽然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但它们又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的一个大系统。我们只有使这个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这部大机器中的各个零配件全部润滑好并转动起来，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建立联防联控网络，学校与家长联手，学校与社区联手，学校与公安民警联手，学校与关工委、未保委、综治委联手，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确定七类帮教对象(学习困难、心理障碍、经济困难、单亲家庭、品德问题、家长犯罪、身体有病)，安排学校领导、班主任、教师、社会热心人士与有关学生开展帮教结对或德育导师制活动，防止学生因各种原因出现行为偏差。健全家长学校，学校要承担对家长进行科学教子理念、

方法的培训，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以及教育子女的责任感，实现家校的有效沟通，形成教育合力。建立城市工读学校，招收问题学生，政府给予补贴，为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社会保障。

未成年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成年人的问题。对此，我们整个社会更需要紧密配合，齐抓共管，负起责任，把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真正做实做好。

(作者单位：宁夏医学院)

责任编辑：石雷

族的大舞台,在元朝又增加了回回人入居和伊斯兰教的传入。最初主要是以“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和随军的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人为主,大都居住于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人户数量都很少。而宁夏地区情况却比较特殊,该地居大元帝国腹地,据中西交通要冲,六盘山麓又是安西王行宫所在,是蒙元驻军的地方,探马赤军、回回炮手、回回匠人、回回商人及其家属等,追随军队行止,早已定居在这个地方。安西王忙哥剌的儿子阿难答(忽必烈之孙),从小就是这里军营附近的一户回回人家抚养长大的。回回人是元代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其政治地位比蒙古人低一等,而远远高于汉人和南人。阿难答自幼受到回回习俗和伊斯兰教礼规的训练,熟谙《古兰经》,通晓阿拉伯文,热衷礼拜,崇信伊斯兰教。至元十七年(1280),他承袭安西王位后,就在所统率的十五万大军中推行伊斯兰教,并命令蒙古儿童行割礼。元成宗铁穆耳坚决反对他的这种做法,甚至拘禁过他,但他宁可不要王位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皇太后阔阔真考虑到安西王在领地“唐兀”(称西夏国故土)已深得人心,唯恐引起民怨,只好劝成宗让步,释放他返回封地。虽然阿难答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铁穆耳死后的争夺帝位斗争中失败被杀,但他在陕甘宁封地倡导伊斯兰教已历时二十多年,使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在西北的传播。

朱明王朝从元朝手中夺取宁夏这块土地,其斗争也是艰难的。当明朝立国以后,大将军徐达曾于明洪武三年(1370)派部将薛显第一次占领过宁夏,但当时明军尚无力控制该地区,因为蒙元虽然退还大漠,仍然不断向西北部边境侵犯,以河套和贺兰山一线边境最为严重,迫使明廷不得不采取“空城”的办法,自洪武三年至五年间,暂时放弃宁夏地区,把全部人户迁到内地,使得贺兰山下、黄河两岸成为一片无人区的真空防御地带。直至洪武九年(1376)才开始陆续征调内地军民移居

屯守,逐步恢复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但政权形式也不同于内地的省、府、州、县,而是根据宁夏地区处于军事前沿,战事频繁的实际情况,采取军卫建置,实行军屯戍边为主和民屯辅助的军政合一方式,对宁夏实行特殊的行政管理。这是宁夏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移民行动。在明代新居民中,有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有明一代,今宁夏区一隅之地,北部设立宁夏镇,不仅委派专挂“征西将军”印的总兵镇守,又钦命巡抚大员驻节,复遣宦官常驻监边,并封皇子为庆王,以宁夏为藩国。全镇设宁夏卫、宁夏前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和宁夏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计七卫。每卫下设左、右、中、前、后五所,加上灵州、平虏、兴武、韦州(群牧)四个独立千户所,合为三十九个千户所。在南部地区除设立固原州和固原卫(内辖五所)以及西安、镇戎、平虏(平远)、甘州(群牧)计九个千户所外,又设固原镇,并以钦差重臣担任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坐镇指挥延绥、宁夏、甘州和固原四大镇总兵,几占全国北边防务“九边重镇”之半数,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固原的得名,也是起于此时。成化二年(1466)开城县被鞑靼攻破,次年决定迁往城北唐宋“故原州”地的“古原州”城重建新城。这座新城就是原固原县城前身,城名因“故原州”和“古原州”转音为“固原”命名,寓意当然是城池坚固固若金汤了。明代宁夏三面临边,终明之世均为用武之区,所以它的军屯和军事建设成绩突出。全镇各类军人总数,最高时达到七万人马,其中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初年,卫所军为20413名,以14184名屯垦,计耕田8337顷有奇,创造了“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成绩,宁夏总兵官何福因此被朝廷“降敕奖谕”。随着水利的兴修,水政管理加强,至万历前期,屯田数已发展为18828顷。虽然到明后期,屯田破坏,人口逃亡,但毕竟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宁夏的农业水利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至于军事建设,以修

筑长城(边墙)为代表。宁夏境内有明代修建的长城,工程十分浩大。自成化八年(1472)倡修,后经历次续修和修补,逐渐形成。东边墙、西边墙、北边墙(含陶乐长堤)和固原旧边墙等四条骨干边墙,全长约三千里,分属宁夏镇和固原镇管辖。同时在长城沿线还扼要设有一些关门,其中最重要的是:镇远关、北关门、大磴口三关、赤木关、胜金关和东关门(长城关)。另外,于临敌前沿一线,或交通要冲的空旷地带,又添筑墩台,派军瞭守,称之为烽燧,俗称“烽火墩”。遇有敌情,白日升烟,夜间举火,墩相递传,让边内有所准备,使军城指挥中心得以提前调兵遣将部署战守。全镇防区内,计有烽燧596座,作为对长城设防的重要补充。当然,贺兰山本身也是一道天然屏障,它有大小山口36处,多数可通人畜,大口则军马通行无碍,明时于大口筑墙、设关,小口择要驻军把守,其防务都比较完善。明朝后期,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宁夏地区也不例外,这里的土地、牲畜和牧场被王府、将军和官吏兼并,屯军外调,连年灾饉,人民逃亡,驻军闹饷,加之农民起义军的不断冲击,终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十一月间,固原、宁夏两总兵不战而降,宁夏南北两地,均归顺于李自成农民军在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明朝在宁夏的统治宣告结束。

进入清朝以后,由于清廷推行“满蒙一家”的政策,居住于黄河、长城之外的蒙古各部已不再是敌对势力,而与内地一样,都是大清帝国的臣民。因此,和平交往代替了战争,长城、军垒都失去了原来的军事意义。宁夏地区的地位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改历代中原王朝汉族统治者与边疆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之间争夺的军事战场形象,从而迎来了清中前期,宁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勃兴的所谓“康乾盛世”。首先,清廷实行“化军为农”和“变兵为民”的政策,废除了明代“无兵之用,有兵之费”的军屯制度,军屯经济为小农经济所代替,原数万名屯军整体转变为向官府纳赋的自

耕农,仅此一项,收入除外,每年又节省军费开支13万两白银。其次,大兴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新修成的水渠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宁夏府水利同知王全臣主修的大清渠,雍正四年(1726)兵部侍郎通智主修的惠农、昌润二渠,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卫县知县主修的长永渠。新渠总长度600里,扩大水浇地约11万亩。另外,对旧渠也及时进行全面疏浚,同时大力加强水政管理,使宁夏的农田水利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再次,招民垦殖,仅在平罗县境内的查汉托护地方,就连片开垦耕地近万顷,曾一度在此地新建新渠、宝丰二新县。乾隆间,宁夏入赋额田为22527顷,相当于前明宁夏镇最高耕地数18828顷的1.2倍。嘉庆间全府有214992户、1392315口,与明万历年间26636户、46125口相比,户增7倍,口增29倍,创造了宁夏历史人口的最高纪录。同样,固原地区也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总督衙门迁往兰州,固原总兵移驻河州,只有陕西提督还驻节固原,军政负担大幅度减轻,加上对前明各藩王霸占牧场的接收,使固原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同步,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大的进步。但是,道光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到同治间,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斗争的鼓舞下,终于爆发了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回民反清抗暴斗争。在这场反清浪潮中,马化龙领导金积堡和宁夏各地穆斯林群众的战争,是西北各地穆斯林人民的中流砥柱。“各地回众皆观望宁郡举止以为顺逆”,“率视金积为向背”。在这场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宁夏回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马化龙及其家族被清军屠杀,数以万计的穆斯林群众离开家园,被迁赶到荒凉的穷乡僻壤苦度生计。但马化龙领导宁夏穆斯林人民反清斗争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打破了清统治阶级吹嘘的所谓“同治中兴”的神话,它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又一次动摇了

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样值得骄傲的是,在后来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以汉族为主的宁夏汉回人民又在甘肃省较早组织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率先发动起义,并很快光复了府、州、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在西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堵塞了西北通往内地的最后一条通道,从而打破了顽固派升允、长庚之流企图迎“清廷西迁”,偏安甘肃,待机复辟的阴谋,同时也缓解了西安革命政府的军事压力,为挽救民军危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民国肇造,宁夏一度改称朔方道,仍归甘肃省管辖,并无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却养成了一支回族小军阀的武装集团,并造成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家族父子侄对宁夏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马福祥于民国元年(1912)任宁夏镇总兵(后改任护军使),率所部昭武军进驻宁夏,1920年调任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由其侄马鸿宾接任(后改任镇守使),直至1925年西北军入甘才告一段落。在这一时期内,马家军出于巩固马氏家族统治的需要和回族军阀排他性的必然表现,在消除内外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平定匪患、保护民生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为地区经济发展同样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兴修水利、创办实业、改善交通、禁种罂粟和提倡回民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做出一些实际成绩,使得宁夏这片土地,能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里保持着相对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虽然贫困,而不至流离失所,尚可以艰难维持生计。1925年,冯玉祥部西北军控制西北以后,虽然冯部为了与蒋介石、阎锡山和李宗仁逐鹿中原,把庞大的战争负担转移给西北人民,使广大城乡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同时也给宁夏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带来三个方面重大变化。其一,宁夏建省。不管宁夏设立行省有什么背景,但它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地方的发展带来契机,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意义深远。其二,中共宁夏党组织创建。冯玉祥部的政工人员,基本上是

共产党员,因此革命新思潮与大军一道涌进封闭落后的宁夏,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又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宁夏,特别是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在宁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全省回汉各族人民的解放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其三,马鸿逵回族军阀统治宁夏。冯玉祥集团在中原战败以后,其势力从西北地区退出。1931年,蒋介石先后任命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从而冯玉祥经营西北的果实却为马氏兄弟分而食之。1933年初,马鸿逵以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和十五路军总指挥的三重身份,开始对宁夏长达十七年的独裁统治。马鸿逵常称宁夏是“第二故乡”和“桑梓”,换句话说他是他的根据地和命根子。所以,从自身和团体利益出发,也要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地盘经营好。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在清丈土地,整顿税制,控制金融,稳定货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提倡科技,并在工农业生产中进行新科技试验,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能随时代的步伐,被动地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马鸿逵集团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出于阶级的本质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他又完全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夏的代表人物,并在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道路上一直走向灭亡。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按照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命令,首先占领宁夏省会银川市,标志着宁夏省的解放。12月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在银川市成立,宣告了宁夏回汉蒙各族人民走向新生,迎来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刘果